

#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肖希明

**摘要** 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民国时期、1950—1977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阶段。文章探讨了这三个历史阶段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与科学技术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教育规模、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影响,以及图书馆学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和输出知识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认为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但社会环境制约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1950—1977年的社会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仍较为缓慢,1978年至今,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实现图书馆学教育社会依存性与自身独立性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变”与“不变”的统一。参考文献 31。

**关键词** 图书馆学教育 社会环境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教育模式 互动 中国

**分类号** G250.9

## The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Society in China

XIAO Ximing

### 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SE) in China has undergone through 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S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in mainly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paper, on one h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on LSE's system, scale, thought, mode, and conten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SE promoted and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rough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This paper,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owing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well as to the active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SE had cultivated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s an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SE was severely constrained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a good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From 1950 to 1977,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China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was considerably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SE, resulting in evident increases in both the quantity and the categories of talents in Library Scienc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vertheless, due to excessive interventions from the politic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Soviet LSE system, the Chinese LSE developed relatively slow. Therefore, it

通信作者:肖希明,Email:xxmwhu2011@163.com, ORCID:0000-0002-0715-603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Ximing, Email:xxmwhu2011@163.com, ORCID:0000-0002-0715-6038)

made limite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and the good interaction was not yet established. From 1978 till now, there have been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Chinese 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LSE was grounded. These changes not only brought rapid development both in the scale and the progressing speed of the LSE but also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ed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pecifically, these changes revolutionized the content and pedagogical system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LSE. Mean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ed processes of the social informatization severely challeng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SE in China. In the decades starting from 1978, the LSE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society, not only by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for library works, as well as for other professions related. Moreover, the LSE actively disseminated and transmitted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o the society, which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SE and the societ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unity of self-independence and social dependence, instrument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dynamism and stability of the LSE. 31 refs.

####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 thought. Education mode. Interaction. China.

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从1920年建立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波澜起伏的一百年。战争的灾难与共和国建设的伟绩,探索道路的曲折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都深深镌刻在这百年历史之中。图书馆学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是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在发展,既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同时又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按照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特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至1949年,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创建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筚路蓝缕,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图书馆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1950年至1977年,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适应社会变革进行调整和获得发展的时期,取得过成绩但也经历过曲折甚至停滞,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十分深刻。1978年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建、改革与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图书

馆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多层次的办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完善,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图书馆学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基本形成。而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回望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特点和规律,思考未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与和谐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解析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的发展受到社会各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而同时教育也反作用于社会各子系统。这就是教育与社会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是非线性的,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有学者指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当我们回顾人类发展历程的时候,往往很难从中剥离出独立的、脱离多样化社会关系的教育主题。”<sup>[1]</sup>

### 1.1 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图书馆学教育是教育这个子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各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和制约来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正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教育规模、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从而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图书馆学教育的整体面貌。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兴办图书馆学教育需要社会经济系统提供资金、人力和物力的保障。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即一方面要求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当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占用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社会就要对它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再次,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图书馆学教育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教育的发展,从普通高等教育向各种形式的在职教育的延伸,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要求。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政治也存在着联系。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虽然与政治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政治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首先,“政治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人们的教育权利,教育的方针、政策、目标,教育的投资主体”<sup>[2]</sup>,因此,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价值、作用的认识,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程度也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民主、稳定的政治环境提倡学术自由,鼓励自主研究和创新,有利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反之,政治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不适当介入和过度干预,就会压抑学术自由和自主创新,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文化具有更为内在的

和本质的联系。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图书馆学教育产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于图书馆事业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而图书馆事业正是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次,从教育与文化作为社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来看,社会文化对图书馆学教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些都深藏于图书馆学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结构中,潜在地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内容、教育理念,进而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对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传播。再次,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也会影响图书馆学教育对外来信息和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和接受程度,以及对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态度。

图书馆学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变得越来越密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从而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必然带来图书馆学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的变革;多层次、多类型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形成,信息技术成为图书馆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科学技术也影响了图书馆学教育的组织形式、教育手段,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新的教学形态应运而生。

### 1.2 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教育向社会输出的主要产品是人才,同时也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事业及相关领域所需要的人才体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为能够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知识。

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从多维度体现出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从经济的角度看,劳动力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曾指出,只有通过教育与训练,才能“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般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sup>[3]</sup>。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正是在普通教

育的基础上将一般劳动者转化为图书馆这一行业的专门劳动者,将较低水平的劳动者转化为较高水平的劳动者,从而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政治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教育虽然是专业教育,但它也要培养人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成为现行政治体系中的合格公民,也要培养学生树立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职业价值观,在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最直接的贡献就是为图书馆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为不同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同时,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保存、整理、选择、传承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学术文化,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的图书馆学术文化的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并为图书馆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更新培养大量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图书馆学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在生产和再生产新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传统图书馆学目录学总结的读书治学方法曾惠及历代学人,而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中产生的诸如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服务、信息(文献)计量等理论和方法,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既是这些知识的传播者,也是这些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者。因为在图书馆学知识的生产中,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同时,也正是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让这些知识在一代又一代的教育传授中,不断产生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 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2.1 民国时期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中国产生并得到较快的发展。新型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培养专门的人才,因此,以图书馆业务技能培训为目的的讲习班、短期培训在一些学校开办。1920年,美国来华学者韦棣华与从美国留

学归来的沈祖荣、胡庆生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起步。1929年以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获准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为“文华图专”)。抗日战争期间,文华图专1938年西迁重庆,1947年迁回武昌,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除了文华图专之外,当时国内还有一些高校先后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或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如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后来又创办了图书馆学系,上海的国民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系,四川璧山创办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学系,等等。这些办学机构大多办办停停。194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虽然以“私立”为主,但也可以看出它与社会存在着紧密联系。

#### 2.1.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步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在教育制度上。新文化运动“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参照,改革中国旧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sup>[4]</sup>,作为新式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理所当然受到关注,“近今教育趋势,多依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化,亦即于是觐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sup>[5]</sup>。因此,韦棣华、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专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创建了一种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即使在具体的学制上,文华图专也是仿照杜威创建的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模式,从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生,学制两年,本科毕业除授予学士学位外,另发给图书馆学专科证书。194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也是从本校文学院

各系毕业或肄业生中招生,学制两年。其次在教育理念上,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思想,成为以批判旧式藏书楼、传播西方图书馆理念为核心的“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资源。作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主将,沈祖荣等兴办的图书馆学教育正是秉持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开放、平等的平民教育理念。再次,在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上,新文化运动力倡引进西方文明,增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华图专早期就是仿照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1928年以后,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逐步建立了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在教学方式上,文华图专特别注意实际操作训练,显然也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影响。在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通过“群育讨论会”的形式,邀请各学科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开办讲座,扩大学生知识面,所体现的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的理念。

### 2.1.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首先是在办学经费上的支持。以文华图专为例,其办学资金就来自社会各方。在其初创时期,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韦棣华在国外募集的资金和美国圣公会的资助。在韦棣华努力争取下获得的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助款,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付给文华图专,成为其独立办学的重要支持。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的拨款,成为文华图专此后发展较为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他社会机构和个人的捐助也对文华图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sup>[6]</sup>。其次,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1933年)上,杜定友等学者就提出议案,“请协会建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指拨棉麦借款一部,于首都设立中央图书馆专门学校”。这次年会通过的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还有:“请本会建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拨款,在北平设立国立图书专科学校”

“请各省教育厅每年考选学生二名,分送国内图书馆学校肄业,其食宿膳费由省教育费中支拨”“各省省立图书馆每年选出学生二名,分送国立图书馆学校,以资训练”等<sup>[7]</sup>。1936年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有“呈请教育部明令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图书馆课程”“请各省教育当局办理图书馆学暑期讲习会,训练图书馆服务人员”,等等<sup>[7]</sup>。总之,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次年会上,都有图书馆学教育的议题,对图书馆学系科的设置、课程拟定、条件保障等方面,均有涉及,足见其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支持。

### 2.1.3 民国时期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制约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然而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民生凋敝,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是战争带来的灾难,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先后于1938年和1940年西迁重庆、成都,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其次是经费的紧缺。经济滞缓,国库空虚,政府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一再压缩文化教育经费,用于图书馆事业的经费更少得可怜”<sup>[8]</sup>。文华图专因为经费来源较多,尚能维持下去,其他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办办停停,难以为继,经费困难显然是重要原因。第三是政府对图书馆学教育重视不够。如前所述,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连续四年提出议案,请政府和教育部添设图书馆专科学校或在大学中增设图书馆学课程,但政府并未采纳。第四是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缺乏认识,导致图书馆学系科生源不足,师资短缺<sup>[9]</sup>。

## 2.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办学环境艰难,但仍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优秀人才。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主力军。文华图专存在的33年(1920—1953)中,培养了图书馆学、档案学本科、专科毕业生354人,讲习班、职训班学员289人<sup>[10]</sup>。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中坚力量和著名的图

图书馆学家。据 1930 年统计,该校毕业生中,有 33 人在图书馆任职,其中任馆长的有 29 人,占总数的 90%<sup>[11]</sup>。1949 年后,文华图专的很多毕业生又成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骨干力量。如汪长炳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钱亚新任该馆副馆长,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黄元福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坤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宪章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顾家杰任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文华学人在国外图书馆界贡献卓著,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冯汉骥、邓衍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李芳馥、房兆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桂质柏,等等。据统计,为美国东亚图书馆作出贡献的文华学子不少于总数的 1/10<sup>[12]</sup>。其中,杰出代表如文华首届毕业生裘开明,毕业后服务于厦门大学,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长达 40 年,他所编写的《汉和图书分类法》,被当时亚洲、美洲、大洋洲、欧洲的 20 多所东亚图书馆采用<sup>[13]</sup>。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受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太多,发展始终受到制约,规模不大,因而对社会的影响有限,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没有能够形成。

### 3 1950—1977 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持续多年的战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七十年代已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等学校从 1949 年的 205 所发展到 1965 年的 434 所,公共图书馆从 1949 年的 55 所发展到 1965 年的 577 所<sup>[14]</sup>。然而,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也有过失

误,甚至出现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所有这些,无不给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带来影响。

#### 3.1 1950—1977 年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 3.1.1 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影响

新中国逐步建立了政治上集中统一、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统一由国家领导,私立的教育机构收归国有并进行合并重组。1951 年文华图专由文化部接管,改私立为公立,1953 年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于 1949 年 8 月从文学院独立出来,学制几经变化。1956 年,经教育部批准,北大、武大两校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均改为 4 年制本科,并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将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设置于两所全国著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这一制度的变革无疑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此后 20 多年,便形成了以北大、武大的图书馆学专业为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格局。虽然 50 年代国内还有几所高校(如西南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也设立过图书馆学专修科,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专业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需求,于是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成人教育蓬勃兴起。以函授教育为例,1956 年和 1960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先后开办了图书馆学函授专修班,至 1965 年,两校在全国 30 个省市设立了函授站,共招生 1 253 人<sup>[15]</sup><sup>214</sup>。这标志着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业余教育制度的建立。

##### 3.1.2 对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9 年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此前美国模式的图书馆学教育做了彻底的“切割”,转而全面学习苏联。“苏式”高等教育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专才教育”,专业划分求专求细,甚至“按产业部门、行业乃至按产品设置学院、系科

和专业”<sup>[16]</sup>,这种教育模式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综合素质不高。受“苏式”教育影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抛弃了通才教育的传统,转而按学科实施专门化教育,课程划分过细,内容重复。“苏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特点是重理论轻应用,强调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而忽略应用知识的传授。受其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注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梳理和讲授,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条分缕析,还引发了学界多次论战<sup>[17]</sup>。

苏联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最为消极的影响,是图书馆学教育中存在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泛意识形态化。这种教育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极“左”思潮结合,对图书馆学教育为害甚烈。它强调图书馆学教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本;它在高校“插红旗、拔‘白旗’”,将著名图书馆学家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它要求图书馆学专业教材要“政治挂帅”“厚今薄古”,完全违背教育自身的规律。

### 3.1.3 对图书馆学教学内容的影响

教育思想决定教学内容。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或是直接翻译苏联的教科书作为图书馆学教材,或是根据苏联教科书精神编写教材、设置课程。刘国钧曾说,“图书馆目录”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原来开设的是分类法和编目法两门课,但在研究了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和经验后,他们认为应该学习苏联“以图书馆的各种目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讲授”<sup>[18]</sup>。这种“全盘苏化”模式,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稍有好转,但其影响仍持续多年。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开始进行调整,包括调整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编写新的教材,如1961—1963年期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文化部文化学院3个单位合作编写了《图书馆学引论》《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目录学》《读者工作》

等讲义。这批教材尊重专家的意见,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sup>[19]</sup>。

1950—1977年,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影响最为剧烈,破坏也最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课和停止招生,教师被批斗并下放农村劳动,图书馆学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虽然自1972年起两校招收了5届两年制的工农兵学员,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图书馆学教育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 3.2 1950—1977年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1950—197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约2000人,另外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等,培养学生200余人,加上北大和武大举办的函授班毕业和肄业的图书馆在职人员约有1250余人,合计培养人才约3500人<sup>[20]</sup>。在50—6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图书馆专业人才十分稀缺的情况下,这批人才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到80—90年代,这批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为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有的担任省市级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馆长,有的成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著名教授、学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1950—1977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可以看到,与民国时期相比,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图书馆学教育为社会输出人才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1949年新中国政府接手北大和武大两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到1977年仍然是这两家。这与同一时期国家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也滞后于同期图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图书馆学教育违背专业教育规律,既抛弃了前贤积累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又脱离了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的主流发展趋势,使得到了197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繁荣期”的观点<sup>[21]</sup>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没有形成。

## 4 1978—2016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4.1 1978—2016年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党和国家从根本上摆脱了“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倡导学术民主自由,为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在经济上,全国上下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财力物力保障,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成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在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这些无疑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78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个真正繁荣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是图书馆学教育重建和迅速扩张的阶段。1978年后,图书馆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规模迅速扩大,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格局形成,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取得进展。

第二阶段(1992—1999年),是图书馆学教育调整和变革阶段。图书馆学教育以机构改名为标志,“向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方向延伸和发展”<sup>[22]</sup>,图书馆学学科与专业归属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在变革。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是图书馆学教育创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教育走向融合,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师资队伍结构明显改善,课程体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专业学位教育为图书情报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 4.2 1978—2016年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 4.2.1 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影响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当时最响亮的时代号角。1978年初春发生的三件大事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是全国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进校,中国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由此拉开序幕;第二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号召;第三是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各类型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这三件大事对新时期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图书馆学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恢复和重建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恢复招生只是这一轮发展的序幕,其后各地兴起的图书馆学专业“办学热”,则是发展的高潮。自1978年起至整个80年代,先后有北京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1978)、上海大学文献信息管理系(1978)、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1979)、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1979)、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1980)、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1980)、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1980)、福建师范

大学图书馆学系(1981)、四川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湘潭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河北大学图书情报系(1984)等兴办。到1990年,设置图书馆学系科、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达55所<sup>[23]</sup>。至此,长期以来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家支撑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格局被彻底打破。除了新办教育机构的增加,图书馆学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也是空前的。1978年至90年代初,这50多家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共计培养本科生近3万人,专科生近5万人,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1980—1990年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培养的函授生超过6000人。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首届招收学员达2万人<sup>[15]218</sup>。如此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决定的。

#### 4.2.2 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建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多类型、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1978年以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基本上只有本科学制(1956年以前为专科)和规模不大的函授专科教育。1978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规范重建和完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始招收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1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建立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至1990年,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山大学等学校(机构)先后获批建立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点。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后,南京大学、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陆续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至2011年底,

我国共有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办学点30个,硕士点55个,博士点9个<sup>[15]227</sup>。除普通高等教育外,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学专业的成人教育、在职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我国已形成一个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多层次、多类型的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决定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即从单一科学学位转向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并举,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2011年,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开始招生。至2016年,全国已有31所高校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授予权<sup>[24]</sup>。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转向对图书馆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面向更广泛的信息职业,克服图书馆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生源学科背景单一的局限,实现图书馆学教育与现代图书情报职业的有效对接。

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变革,既是图书馆学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4.2.3 对图书馆学教育内容体系的影响

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是教育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内在要求。图书馆学教育顺应时代的发展对教育内容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课程体系的变化。1985年、1992年、2003年和2009年,分别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持讨论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主要的思路是核心课程在基本稳定情况下适当调整。2009年确定的核心课程为图书馆学基础、信息资源建设、信息与知识组织、信息服务、信息检索。推荐的核心课程为数字图书馆、图书馆管理、目录学、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在核心课程之外,各教学单位普遍压缩传统课程的比重,开设新课程,如1980年代增设了情报科学、管理科学、图书馆自动化、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课程,1990

年代开设了计算机、因特网、数字图书馆等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

第二是理论课程内容的变化。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是清理了教材和教学内容中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后便是对经验图书馆学内容的扬弃,并逐步建立了“以现代科学精神为基本导向的新型图书馆学”<sup>[25]</sup>,这一过程清晰地体现在从80年代后期到今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中。

第三是实践教学的变化。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图书馆学教育的传统,但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应时而变。近20年来,各教学单位都设置了实验课程,建设了实验教学系统,集成了虚拟图书馆、网络课堂、开放实验室、文献资源管理、多媒体教学等模块,学生通过实习可了解真实的图书馆业务工作环境,有助于学生毕业后快速适应图书馆实际工作。

#### 4.2.4 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走向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对图书馆学教育走向影响最直接的,一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前者带来的影响是学生毕业后不再由国家分配而是自主择业。当图书馆职业还没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时候,图书馆学专业自然很难成为考生优先选择的报考专业,因而图书馆学专业出现了招生困难。后者则要求图书馆学教育改变人才培养模式,融入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使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兴起“改名潮”。第一次纷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图书情报学系”“文献情报科学系”,等等。此次改名与国际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专业的融合发展。第二次改名是将“图书情报学院(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院(系)”。这次改名推动了图书馆学教育向信息管理教育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更适应社会各类信息职业对人才的需求。然而,

此次“改名潮”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图书情报教育机构的改名实际上是随大流的行为,而不是自身改革的内在需求。因此,改名后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与“信息管理”并不配套,“信息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难以理顺。同时,改名也引起业内人士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话语权丧失、进而被边缘化的担忧<sup>[26]</sup>。

#### 4.3 1978—2016年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1978—2016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而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空前巨大的。30多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以笔者之力是无法准确统计出来了。但人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日中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各类高校图书馆和科学与专业图书馆中,已经有了那么多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馆长、副馆长,有了数以万计的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业务骨干。在今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大都是这30多年来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优秀人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近些年来图书馆学教育致力于面向更为宽广的信息职业培养人才,而新的信息环境也为图书馆学教育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近些年来图书馆学教育也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银行、商务机构、互联网公司、信息安全等领域输送了大量新型信息服务人才,并且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

与1978年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不同的是,当今的图书馆学教育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也在生产并向社会输出专门知识。如信息组织知识,正广泛应用于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和描述;信息检索知识,正成为广大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得力工具;信息服务的理论与方法,早已突破图书馆的范畴,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正因为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图书馆学教育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 5 对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表明,

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图书馆学教育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两者实现良性互动,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种良性互动需要实现以下几个统一。

### 5.1 图书馆学教育的依存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是有依存性的,它依赖社会各子系统给它提供发展的条件,同时它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项传播专门知识、培育专业人才的事业,它也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符合这种规律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独立性。图书馆学教育的依存性与独立性是相互依存的。依存性决定了它需要从社会获得发展的资源,与社会交流信息并不断调整发展目标。独立性则是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sup>[27]</sup>。两者辩证统一,共存共生。讨论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图书馆学教育应该认识到只有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并据以调整自身的目标,才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之道。但是,这种“适应”并不是盲目迎合。前几年,有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为了摆脱困境,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社会上什么职业、行业热门、时髦,就开设什么课程,于是,金融学、国际贸易学、会计学、广告学等都进入了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而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信息组织、信息描述等,却被边缘化了。其结果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没有掌握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而所谓“其他学科的知识”,只学会了几个名词术语,根本派不上用场。这就是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依存性和独立性的认识产生偏差,这样做既不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也有损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 5.2 图书馆学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以追求

功利为目的,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后来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等人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用“工具理性”指称一种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sup>[28]</sup>。价值理性是指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性不回避功利目的,也不反对满足人的当下需要,但它更关注人的长远需要,关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过分追求教育的功利性,认为教育纯粹就是学生当下求职谋生的手段,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设计中就是技术至上和技术崇拜,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理论课程被边缘化,计算机课程成为核心课程。价值理性则认为图书馆学教育也要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和长远需要,关注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设计中就是强调宽口径、厚基础,既要学会技术,也要掌握理论,更要懂得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各种技术工具为人类服务<sup>[29]</sup>。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与教育的依存性和独立性也是相关联的。图书馆教育的依存性比较容易导致工具理性,独立性又使图书馆学教育努力保持价值理性的主导地位。因此,图书馆学教育要致力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与和谐。在图书馆学教育中要做到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理论基础教育与应用知识教育并重,培养的人才既要熟练掌握图书馆现代技术与方法,更要深刻理解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

### 5.3 图书馆学教育“变”与“不变”的统一

面对汹涌澎湃的社会信息化浪潮,图书馆学教育的“变”是大势所趋,“不变”或“不及时变”的后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芝加哥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等老牌、名牌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关门歇业”的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美国若干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LIS)教育机构,于21世纪初发起了

以整合所有与“信息”有关的学科教育为目的的“iSchools 运动”。iSchools 致力于探索信息、技术与人三者的交互作用,强调运用信息和信息技术为人与社会服务,并在这样的理念下整合学科,使得 iSchools 院校既区别于传统的图书情报学院,又区别于以技术为导向的计算机、信息工程等学院,从而为 LIS 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也为 LIS 教育在新的信息环境下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iSchools 很快引起了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界的关注,iSchools 的理念也很快为国内所接受,并借鉴国外 iSchools 的经验,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iSchools 运动的目的是试图融合传统的图书馆学、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计算机科学、通讯技术等有关信息的各种学科,找出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从而将这些学科整合成一个大学科群<sup>[30]</sup>。iSchools 运动的初衷并不是“去

图书馆化”。然而,考察国内外 iSchools 几年的运行,可以看到,它在机构名称、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去图书馆化”的倾向<sup>[31]</sup>。其实 iSchools 的特色和优势,就在于它不仅重视信息和技术,更重视信息领域研究中“人”的因素,融合了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理性。如果 iSchools 淡化“图书馆”的色彩,那么它的特色和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在汇入 iSchools 运动,融入信息学科群的时候,也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确已陈旧过时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不变的是图书馆学期总结和对知识信息收集、组织、存储、查询、传播和提供利用的核心理论与方法,以及世代传承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文传统。只有这样,历经百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才能在跨入第二个百年的时候,依然生机勃勃,活力无限。

## 参考文献

- [1] 刘精明. 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3.(Liu Jingming. The state,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4,83.)
- [2] 张立新,王雅林. 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理释义及其调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99-103.(Zhang Lixin, Wang Yalin.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education & society and their tuning[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dition, 2009(1):99-103.)
- [3]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5.(Marx K. Das Kapital[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5:195.)
- [4] 智晓静. 新文化运动中的图书馆事业[J]. 图书与情报,2009(1):33-36.(Zhi Xiaoj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09(1):33-36.)
- [5] 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会呈文[G]//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2卷.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555.(Petitio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China's board of directors[G]//Fang M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o Xingzhi: the second volume.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555.)
- [6] 彭敏惠. 文华图专办学资金来源考[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96-105.(Peng Minhui. A study of the funding resources for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3(2):96-105.)
- [7] 秦亚欧,魏硕,金敏求. 中国近代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促进和影响[J]. 图书馆学研究,2010(11):94-98.(Qin Ya'ou, Wei Shuo, Jin Minqiu.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Chinese modern library association

- fo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0(11):94-98.)
- [ 8 ] 谢灼华.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6.(Xie Zhuohua.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M].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1988:6.)
- [ 9 ] 赵长林.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滞缓之剖析[J]. 图书馆杂志,1994(6):54-56,37.(Zhao Changlin. Analyzing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J]. Library Journal,1994(6):54-56,37.)
- [10]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校友名录(1920—2010)[Z].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0.(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The alumni list of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1920 - 2010) [Z].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2010.)
- [11] 梁建州,梁贻如. 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摇篮——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J]. 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5):64-81.(Liang Jianzhou, Liang Zhanru. The cradle for Library and Archival Scienc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 record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1996(5):64-81.)
- [12] 彭斐章,彭敏惠. 文华精神,薪火相传[J]. 图书情报知识,2010(3):116-120.(Peng Feizhang, Peng Minhui. Inheriting and delivering the spirit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0(3):116-120.)
- [13]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5):61-65.(Cheng Huanwen. The library spirit beyond time and space: Ms. Mary Elizabeth Wood, Mr. Shen Zurong and Mr. Qiu Kaiming of “Three-in-One” and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2(5):61-65.)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65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82,298(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China in sixty-five years[M]. 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4:282,298)
- [15]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4.)
- [16] 戴玉纯. 基于战略的大学排名管理[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124.(Dai Yuchun. Universit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M]. Hefei: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2007:124.)
- [17] 林梦笑. 苏联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5):91-95.(Lin Mengxiao. The influences of Sovie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al ideology on China[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2015(5):91-95.)
- [18] 刘国钧,等. 图书馆目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Liu Guojun, et al. Library catalogue[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1957:1.)
- [19] 彭斐章. 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回眸与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1999(4):3.(Peng Feizhang.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ew China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1999(4):3.)
- [20] 吴慰慈.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5):2-5.(Wu Weici. Reform-

- 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J]. *Library Work and Study*,2003(5):2-5.)
- [21] 王子舟.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70-78,96.(Wang Zizhou.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 China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recent ninety year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9(6):70-78,96.)
- [22] 陈传夫,吴钢,唐琼,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J]. *图书情报知识*,2008(5):5-14.(Chen Chuanfu, Wu Gang, Tang Qiong,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education in the 30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2008(5):5-14.)
- [23] 倪波,郑建明. 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的发展与成就[G]//《中国图书馆学年鉴》编委会.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42-346.(Ni Bo, Zheng Jianm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G]//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hina Library Yearbook*, China Library Yearbook 1996.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7:342-346.)
- [24] 陈传夫,陈一,司莉,等. 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授权“四个十年”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1):17-28.(Chen Chuanfu, Chen Yi, Si Li, et al. Fo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1):17-28.)
- [25] 范并思. 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1):4-16.(Fan Bingsi.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56-2016[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1):4-16.)
- [26]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313.(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Beijing: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313.)
- [27] 张启树. 论教育活动的相对独立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9(6):7-11.(Zhang Qishu.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 activities[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1999,19(6):7-11.)
- [28] 赵薇洁. 论中国哲学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及其当代意义[C]//方克立等. *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11-626.(Zhao Fujie.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C]//Fang Keli, et al.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611-626.)
- [29] 肖希明. 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21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J]. *图书馆*,2004(1):1-4.(Xiao Ximing. Integrating of the tool reasoning and value reasoning;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J]. *Library*,2004(1):1-4.)
- [30] 叶继元. iSchools 与学科整合[J]. *图书情报工作*,2007(4):6-9,51.(Ye Jiyuan. iSchool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I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7(4):6-9,51.)
- [31] 肖希明,李琪,刘巧园. iSchools“去图书馆化”的倾向值得警惕[J]. *图书情报知识*,2017(1):19-25.(Xiao Ximing, Li Qi, Liu Qiaoyuan. Beware the “Delibrarization” in the iSchools[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2017(1):19-25.)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2017-02-27)